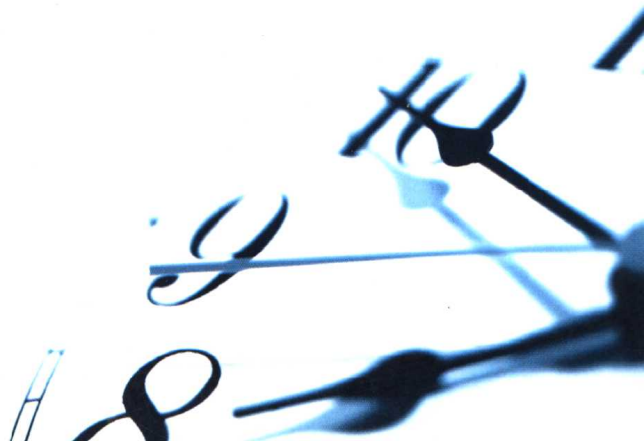


回答今天

上海人民出版社

蔡翔 \ 著

Huida Jintian



1

2

I267.1

C062

回 答 今 天

上海人民出版社

蔡翔 \ 著

Huida Jintian

8963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答今天/蔡翔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ISBN 7-208-03485-0

I.回... II.蔡...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512 号

责任编辑 张 珏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回 答 今 天

蔡 翔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1 字数 171,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3485-0/C·660

定价 15.00 元

自序

“回答今天”，原是我数年前一篇短文的题目，移用来作书名，总觉得有些口气过大。但是犹豫再三，还是用了。当时写那篇短文的用意，不过是吁请知识界关注中国的“今天”，同时也为了策励自己。时过境迁，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在关注今天的中国问题，而且多有建树，读之使人解惑。至于我，虽有所思，但限于学力，却少有突破。因此，“回答今天”，成了一堆零星的想法，而且名不副实。但是，我却想以此作一个纪念，以激励我今后的前行之路，始终关注着我的生命所在。

这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随笔 1—57，下编则由一些独立成篇的文章组成。大部分的文章都写于 1995 年以后。

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在这本书里，我已偏离了我的文学批评的专业。个中缘由，我已分别在随笔 6—10（有关批评的一些随想）和随笔 21—24（自由写作和个人立场）中略有说明。但是我并未立即转向某一具体的学科，只是站在边缘，用一些随笔性的文字，记下我对时代的所思所感。即

使这样,我仍觉得力不从心,尤其是正面进入思想批评,本非我的能力所及。支持我的,只是一种前行的希冀,一种难以割舍的“今天”情结。我很难安静地坐在书斋内,沉湎于纯粹的“学术”,我无法拒绝内心对“今天”的回答欲望,尽管我知道,即便倾我一生之力,也并不能“回答今天”,但仍然忍不住走出专业,一路东走西望。对于一个学人来说,这可能就是对学业的一个致命打击。但我不是,我只是一个自由写作者。尽管我对学术充满崇仰之心,但此生命运已定,我沉入自己迷惘的内心,不断地怀疑和自我怀疑。严格说来,我真正要回答的,仍然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所疑所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许是一个为自己而写作的人。

对于90年代来说,1994年大概是不容忽视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爆发了“人文精神”的讨论。因为各种原因,这场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其论争水平,也很难令人满意,但风波过后,不管是同意或者不同意,却因为这场争论,陷入更多的沉思之中,许多的问题,也因为争论而被激发。说来也怪,“人文精神”这个概念,不仅没有束缚住人的思维,相反,却经由这场争论,而进入更复杂的思想状态。这或许是这场争论给人收益最多的地方。而对于我来说,久已潜伏的对社会思想的兴趣也因此引发,在阅读书本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社会的阅读。

在这个时代,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矛盾集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有时甚至会产生某种紧张、对立甚而分裂的心理状态。而这种状态,自然是我成熟的标志,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是我走向现实的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类问题的冲突。它们纠缠着我,要求理出一个头绪。

我想,在这些矛盾中,一个人最感困惑的,是他的“身份”的统一保持。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在艺术领域,我执著于我的美的立场,吁求人的彻底解放。但是,当我走进社会领域,我会发现,我无法用艺术性存在去替代人的日常性或社会性的存在。执著于一端,会使人产生如火的激情和鲜明的旗帜飘动。但是,在我无法解释我所遇到的问题时,过于鲜明的旗帜,反而令我私心不安。我不可能回避我所面临的问题,甚而弃之不顾,以制造一面旗帜。

我来自底层,我是一个平民的儿子,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我遭遇的问题,有许多是非艺术性存在的问题,是牵涉到普通人民的存在利益的问题。因此,我无法漠视正义、公正、平等、幸福、安宁……等原则,同样,我也无法根本排除制度、市场经济乃至现代化等等问题的重要性。而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又守护着我的终极目的,渴求一种纯粹精神的信仰,吁求一种美的解放。在本质上,我可能更倾向于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一种不死的激情燃烧,乌托邦的伟大召唤从未在我心头熄灭。但是,从一段漫长的历史中走来,却又多少对“美的侵略性”生出些许的警惕。在某种意义上,美只是我们的一种想象,一种想象性的实践活动,而无法直接转换或替代现实的社会实践。现实存有它的“禁忌”,而“禁忌”所在,也正是普通人民的利益所在。我对绝对的道德说教存有反感,那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并由此伴生的道德救世心态,不仅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而且漠视甚至凌驾于普通人民之上。最可怕的,莫过于把人的“内心”也管起来。

我们曾经设想,所有的善的要求,诸如公正,自由,正义,平等,幸福……,等等,都是相互融和,或者如托克维尔

所说的,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平等,最后会融汇在一个终极点上。这构成了我们对社会,对现代化的坚定信念。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一元论式的信念正在遭到挑战。而最痛苦的,莫过于这种信念的逐渐动摇,各种善的要求处在剧烈的对抗之中。也许,在冲突和相互的限制中,才可能获得一种平衡,但这与我们渴望的“完全”毕竟相距甚远。或许,只有艺术,才是我们美的信念的最后栖身之地,在那里,我们迎接人的彻底解放,进入一种完全的终极的自由状态。

但是,尽管如此,有一种立场并未改变,那就是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最终的批判,则正是美的批判。

有几篇文章在这里补充一下。

“随笔 1—5”(理想主义者成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可能)和“随笔 11—15”(关于制度和共同伦理)应该说是两篇相互补充的文章。后一篇文章主要针对前文所说的“走出制度神话”。我在“随笔 1—5”中,曾经认为制度不可能解决人的终极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忽视制度(乃至其他)的重要性,这就是“随笔 11—15”所要补充说明的。而我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两者的背反之中。

“随笔 25—29”(有关“解放”的语词随想),写于 1995 年 8 月,但发表较晚,因为一直没有把握,而且恐引起误解。我并不否认“解放”的重要性,相反,我认为对于人类来说,这个词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词还必须要有其他的词的补充,仅仅只有激情是不够的。有一点可能没有表达得清楚,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想叙说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个人”转变为“社会概念”,这种重大改变,有时候几乎是无法察觉的。当然,这个问题不



可能在一篇文章中解释清楚,而且也因为我的学力所限。

写完这篇文章以后,我才接触到 I·柏林的自由理论,后来写了一篇阅读笔记,基本上是抄录式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无再饶舌的必要。尤其是把“消极自由”诠释为“消极避世”,那只是理解者的错误,而非柏林本意(这可能和翻译有关)。我只是在文末,提到了“想象的自由”。因为柏林所说的“自由”,基本上属于政治哲学,在美的领域,“自由”还应该有更多的涵义。

现代性是近年的热门话题,“随笔 30—36”(有关现代性问题的阅读札记)倒也不全是凑热闹之作。对现代性的批评来自于各个方面,我们所需警惕的,是用“农民性”来批评“现代性”,或者说,用“共同体精神”来压抑个人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我可能是个二元论者,一方面,我们感觉到现代化可能带来的人的各种异化。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又远未完成,个人权利尚需得到一个空间的保证,而这又是与现代化紧密相关的。因此,盲目的肯定一切对现代性的批评(尤其是对某一段历史),便有可能把我们导入某一误区。

下编中的《广告乌托邦》一文,写作年限较早,在 1994 与 1995 年之前。我对大众文化一直有着很浓的兴趣,也很欣赏罗兰·巴特的某些文章(比如对照片的分析)。我觉得罗兰·巴特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文化批评的文本。这组文章应该说受到了他的一些启发。原来有过野心,企图搞成一本小册子,后来因为各种杂事,也就搁浅。我对大众文化一直持有双重态度,一方面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商业化倾向,因此常常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并相应掩盖了社会更为严峻之真相。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大众文化中,又不自觉地流

露出某些大众生长着的革命性因素，而这又是需要知识分子予以价值导引的。我曾经兴趣很浓，甚至试图做些服装、故事之类的研究，但最后选择广告作了一些文字。不过，我仍然希望能重视大众文化的研究，而这方面的工作，在90年代似未引起更多的重视。

《私人性及其相关的社会想象》，现在看来，很多地方都显得松懈，概念也不够严谨（比如市民社会），而且，多少有些乐观，没有注意到社会的过度私人化可能带来的其他结果。而这些问题，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也早有论述。

不过，有一点，我仍然坚持着，那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必定是经济自由，这也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根本性态度。当然，市场经济（尤其是目前）亦会带来众多的问题，比如差异、平等、公正，等等。当一个人“自由”得一无所有时，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些问题，我在另外的文章中，略有涉及。

我在“后记”中，已经提到，在写作这些文章的同时，我还写了许多散文，这些文章亦已汇集出版，取名为《神圣回忆》。在散文中，我更多地诉诸于情感与本能的冲动，彷徨与内心的苦闷。这二本书比较完整地表现出我近年的内心世界。

近年来，我较少使用“理想主义”一词，这并不证明，我已从理想主义的立场撤退，甚至放下了这面曾经激动过我的光荣旗帜。仅仅只是因为，我们必须正面我们遭遇的问题，只有在问题的清理中，理想才能获得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持，它猎猎作响，而不只是一个为了证明自己的语词。

对于我来说，必要的非文学性的思想仍是需要的，对于

今后的文学批评,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思想资源。这本书虽是偶一为之,但毕竟是一个阶段的所思所录。

我们在前行之路上艰难跋涉,人到中年,忧患于世,但壮怀犹存,因此,虽知困难众多,仍勉力做去。以此自励,未敢忘少年时代的激情缠绕。

1999年春

目 录

自 序	1
-----	---

上 编

随笔 1—5	理想主义者成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可能 …	3
随笔 6—10	有关批评的一些随想 ……………	15
随笔 11—15	关于制度和共同伦理 ……………	26
随笔 16—20	关于知识和知识的限度 ……………	35
随笔 21—24	自由写作和个人立场 ……………	41
随笔 25—29	有关“解放”的语词随想 ……………	50
随笔 30—36	有关现代性问题的阅读札记 ……………	68
随笔 37—41	走近历史 ……………	87
随笔 42—45	大众化还是化大众 ……………	101
随笔 46—52	有关“自由”问题的阅读笔记 ……………	112
随笔 53—57	八十年代的批评与承继 ……………	134

下 编

我们走向哪里·····	147
话语的失落·····	156
广告乌托邦·····	163
短话短说·····	185
私人性及其相关的社会想象 ——一种历史沿革的关系描述·····	218
后 记·····	247

上 编

随笔 1—5

理想主义者成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可能

1

我在漫步今日城市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幻觉。在这种幻觉中,城市被工地化了,到处尘土飞扬,古老的或者不那么古老的房屋被成片推倒(一派断垣残墙的落日景观),一切的优美均已不复存在;通向遥远古代的记忆被推土机的隆隆轰响拦腰截断,然而正是在这机器的隆隆轰响中,脚手架却在每日地向上生长,生长着人的希望,也生长着各种丑陋的但又是活泼泼的生命欲望。

作为一种隐喻,“工地”给我带来太多的联想。一切正在毁灭,一切正在生长,我们正挣扎在这种悖论的方生未死之间。“工地”使我联想到劳动(劳动创造财富),欲望蒸发出的创造热情,也使我联想到夜间的强暴与谋杀。“工地”给我一种现代性的虚假承诺,而大量的丑恶也在“工地”上每日生长。多种联想的镜头组合使我对我们的此刻生存产生出一种深深的怀疑和茫然。尚未完全死去的理想主义迫使我们继续追问:毁灭的是什么?生长着的又是什么?

对于昨天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他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的时间信仰：新的总是好的，“方生”必然优于“未死”。这种唯“新”主义的新/旧之争简化了（或代替了）更为复杂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斗争。而流风所及，甚至影响到现代汉语在时间问题上的用词贫乏。在1994年的某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使用了“面向新世纪的文学”一语。一位朋友异议说：是否“新”就意味着下一世纪的文学必然优于现在的文学？这当然不是会议组织者的本意，而是“新”唤醒了人们有关时间的文化记忆并产生出一种解读错觉。因此，有人又反问：不用“新”，我们又该使用什么样的中性字眼来表示这种时间意义？在这种问与反问中，固然显示出现代汉语在时间问题上的用词贫乏，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出唯新主义所创造的时间神话在今天所遭遇的严格的质疑和批判。

今天的理想主义在其本质上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悲观主义倾向，当其不再以“新”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信念依托时，也就因此失去了时间上的意义支持。当然，困窘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人类几千年的乌托邦的梦想实验在今天所遭遇的毁灭性的打击和失败，则进一步使今天的理想主义者失去了其全部的时间支持（对传统的批判和解构中断了他们复古的可能）。他们也曾为自己的信念寻找空间的支持，然而在资本的全球化过程中，这种寻找很快为更大的失望和愤怒所代替。对于中国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失败和失望聚集在时间和空间的同一交汇点上。

因此，他们渴望重新获得自己的信仰支持和存在的意义系统，一种艰苦的寻找在今天重新复活。而在这个艰难的寻找过程中，面对每日生长着的丑恶，他们只能愤怒地大

声疾呼：不能这样！然而，“那么应该怎样呢？”在这种善意的或者恶意的世故的或者嘲讽的高智商的或者低智商的提问中，他们有时则显得过于迟疑和审慎（这种迟疑和审慎亦显示出他们在今天的逐渐成熟）。

失望并不等于可以就此虚无。在今天，他们的状态的确悬浮，然而正是在这悬浮的状态中，精神被纯粹地坚持下来。命运规定了今天的理想主义者成为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可能，他们拒绝了各种外在指令，而只听从自己作为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良知召唤，他们相互寻找相互激励，他们必然继续追问终极的意义所在：毁灭的是什么？生长着的又是什么？

2

所谓“转型期”概念的提出，其社会背景无非是指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得以确立并且在政治上获得了某种合法性。然而在这社会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却相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困扰和困惑，这种困扰和困惑很多是因为将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或形式上的合理性）与价值层面的合理性混淆起来进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身分（或立场）甚至批判能力。

我想我们可以在此以“交通警察”作一蹩脚的比喻。“交通警察”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使事故率大大下降从而维持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因此在秩序层面上，“交通警察”具有无可否认的合法性（或者形式上的合理性），同时它的某些合法性亦可转化为价值上的（比如人对责任和义务约束和规则的认识与遵守），但是如果我们对此意象（交通警